

纪念《兰亭集序》问世 1640 周年

王羲之 研究论文集



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

王羲之研究论文集

劉正成署



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

(浙)新登字第11号

顾 问：王玉池
主 编：鲍贤伦
副 主 编：陈 述 王 伟

特约责任编辑：宣大庆
封面设计：宣大庆
扉页题签：刘正成
版式设计：庆 予

王羲之研究论文集

——纪念《兰亭集序》问世1640周年

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

(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邮编310002)

浙江上虞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56千字

1993年11月第1版

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00

书号：ISBN 7-81019-269-8/J·239

定价：8.00 元

01010452488X 郑州大学图书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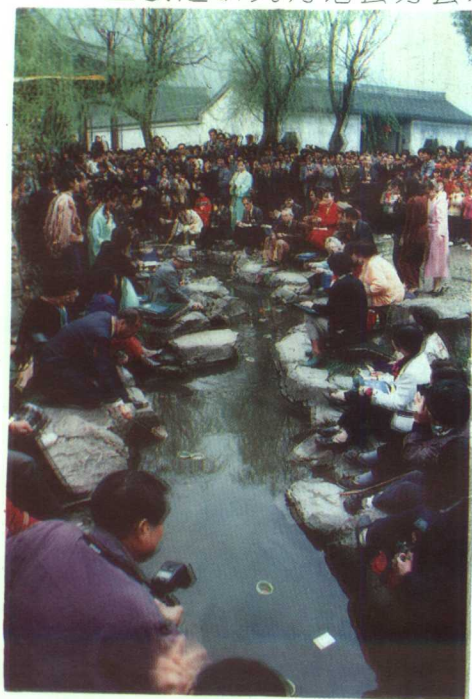


1993年3月25日·紀念《蘭亭集序》問世1640周年暨王羲之研究討論會在紹興蘭亭右軍祠內開幕。

6009063



王羲之研究讨论会分会场研讨场景。



参加'93 兰亭书法节的代表在兰亭举行曲水流觞活动。

前 言

绍兴市文化局局长 鲍贤伦
绍兴市书协主席

王羲之在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一挥而就《兰亭集序》时，大概是不太经意的，更不会想到他正在创造着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“神话”。在他身后，有那么多虔诚的追随事仿者，有那么多悲壮的试图突破藩篱者，有那么多机杼叠出的考证研究，有那么多相似的或各执一端的评说辩争……几乎所有的参与者实际上都在仰望。从仰望中获得崇敬、乐趣，甚至痛苦。

由于绍兴是《兰亭集序》的产生地，绍兴市民便依靠市人大的决定有了自己一年一度的节日——兰亭书法节。时至公元1993年，当纪念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问世1640周年被确定为是年书法节的主题时，策划举办一个全国规模的研讨会便是自然不过的事了。在入选的四十余篇论文交流之后，稍事筛选，这本论文集便也跟着产生了。

有论文在，已不必赘述。其中有广证博引纵横潇洒的名家宏论，也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专家新述；有蹊径另辟侧打正着的清目之文，也有一些对现有材料的精细梳耙、一些现代人的阐释感悟……每篇文章都记录着作者自己新的探索成果，都表达了作者自己对王羲之的新的理解。我们把它们编印成集子，不正为作

者们的探索过程、认识阶段留下了一个较深的印记痕迹，也为当代的王羲之研究增添了一份较新的资料吗？为作者服务，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，这便是我们编印论文集的初衷。

中国书协副主席李铎、刘艺先生，副秘书长张虎先生亲莅书法节与研讨会，对节会给予了支持和具体指导。中国书协副秘书长、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正成先生慨然应允为本集题写了书名。在此一并表示感谢。特别是中国书协学术委员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玉池先生不仅率先在研讨会上发言，会后还寄来了论文的补记，并应邀担任论文集编写的顾问，这直接鼓舞我们编就了这本论文集。

论文集是研讨会的产物，研讨会是'93兰亭书法节的组成部分之一。绍兴市文化局、文化系统和市文联的许多同志为此直接间接出了力，这是不能忘记的。

1993年11月于绍兴城南望帆轩

目 录

前言	鲍贤伦 (1)
一代书风 千年明镜——论王羲之书法艺术	王景芬 (1)
王羲之《姨母帖》若干问题的假定	王玉池 (29)
古永欣寺在绍兴考	王汝涛 (42)
“龙跳虎卧”的王羲之	俞建华 (56)
王羲之其人及《兰亭序》	(香港) 余雪曼 (65)
论王羲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	宋学农 (70)
王羲之亦儒亦玄思想辨析	王 伟 (83)
王字风格构成论	赵雁君 (92)
王羲之草书与中国草书的发展	陈仲明 (102)
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与王羲之书法	(香港) 王齐乐 (116)
王羲之及王氏一系书风比较	陈 峰 (126)
兰亭原址与兰渚湖遗址考	盛鸿郎 (139)
王羲之生卒年辨正	潘祖炎 (151)
右军书体考	张润民 (158)
王羲之在戴山故里遗迹考	周蒂棠 周燕儿 (168)
从《七月》、《都下》二帖试论王书本来面目	(香港) 曾荣光 (176)
王羲之任职吴兴太守二考	王似铎 (181)
王羲之号“谿斋”考辨	张秀铤 (186)
关于“神授蔡邕笔法”与王羲之传说中神秘现象之 我见	葛鸿楨 (191)

由王羲之及《兰亭序》引发的一段思考·····	沈 伟(196)
从《兰亭序》的“涂改”说起·····	章剑深(203)
云门寺——兰亭之后又一书法胜地·····	陈 述(213)

封面《兰亭序》图版，为宋拓《定武兰亭序》（独孤僧藏本）。

一代书风 千年明镜

——论王羲之书法艺术

王 景 芬

—

王羲之是我国古代书坛上的一颗巨星，在一千五、六百年的书法艺术史上，他的书法始终成为人们的楷模，影响着书法发展的进程。他创造了一代书风，成为千年的明镜。人们照着他的镜子，又投入了自己的面貌，把他的书风折射得五光十色。人们把他捧到“书圣”崇高的位置，不时也有“有女郎才，无丈夫气”的批评。但大多时又把他当成偶像，亦步亦趋，忘记了历史的进程，愈往后去看他，愈觉得他是不可攀登的山峰。但是，时代前进了，对于古人的艺术，只能是借鉴，总不能只是模仿。失去时代感，失去创作个性，就不是高明的艺术家。虽然，书法艺术具有抽象性，富有形式美感，结构和笔法技巧性强，要重视继承优秀的传统，但是继承的目的还在于出新意。王羲之之所以能在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取得崇高的地位，最重要之处也就在于他的创造精神。王僧虔《论书》云：“恰与右军俱变古形，不尔，至今犹法钟（繇）、张（芝）”。故王羲之的贡献在于创新，他改变了钟繇等人的古体和质朴书风，创造出适应当时社会审美观点的流美秀逸的风格，形成行、草、真书的独立机制。当然，任何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出现，都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，都有他的条件和气侯，既是历史文化的沉淀，又是时代环境所造成的。

中国书法发展到汉末魏晋时代，已走完它的“自然天成”阶段，“鼎彝金石之传，期间多以形象为主，而文采未备也”（《宣和书谱·篆书叙议》）。中国书法早期阶段以模拟自然为主，虽然这种模拟自然具有理想主义的表意性和抽象性。“颓若黍稷之垂颖，蕴若虫蛇之棼缊。扬浓振撇，鹰跂鸟震，延颈胁翼，势欲凌云”（蔡邕《篆势》见《四体书势》）。这种对字形结构和笔画形象性的描绘，正是中国书法艺术早期以象形文字为主的特征。由于中国早期书法艺术以模拟自然为主，质朴古拙甚至带几分神秘的气氛，缺少“文采”，表情和写意也都受到较多的限制。在篆书隶化和隶书草化、行楷化的历史进程中，汉字的象形性被抽象性所代替，虽然它始终没有脱离象形这个“源”，但是线条自由化和纯洁化，表情达意的范围扩大、鲜明了。特别是今草的出现，以动为主的线条，更能任情恣性，更适合那些具有艺术素质的文士性情。“写迹之变，乃惟佐隶，薶彼繁文，从此简易。厥用既弘，体象有度，焕若星陈，郁若云布，其大径寻，细不容发，随事从宜，靡有常制”（《四体书势》）。又索靖《草书势》云：“盖草书之为状也，婉若银钩，漂若惊鸾，舒翼未发，若举复安。虫蛇虬蟉，或往或还。”这都是对隶、草结体与线条比喻性的描写。去繁就简净化了的线条，根据需要，自由表现，或疏朗，或缜密，或平直，或蜿蜒，或方折如角，或失规旋转，修长补短，异体同势，表现出各种气势和情调。“以其挣脱和超越形体模拟的笔划的自由开阖，构造出一个个一篇篇错综交织、丰富多样的纸上音乐和舞蹈，用以抒情和表意”（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42页）。书法艺术已进入一个完全自觉追求“文采”的新阶段。经过张芝等人的探索，虽然“征聘不问此意，考绩不课此字”，但是，草书风行了，爱好者们如痴如狂地追求着书法艺术美，“钻坚仰高，忘其疲劳，夕惕不息，仄不暇食。十日一笔，月数丸墨。领袖如皂，唇齿常黑。虽处众座，不遑谈戏，

展指画地，以草判壁。臂穿皮刮，指爪摧折，见鳃出血，犹不休辍”（赵壹《非草书》）。这种狂热的心理姿态，不是对功名利禄的追求，完全为书法艺术美的魅力而着魔。东汉以后，已有了专门从事书法艺术的专业书法家出现。从东汉到东晋三百年来，出现了一大批有成就的著名书法家，如杜度（公元76—88前后）、崔瑗（77—140）、张芝（约168—189前后）、蔡邕（133—192）、梁鹄（约168—189前后）、刘德升（147—189前后）、卫觐（约220—260前后）、韦诞（176—253）、钟繇（151—230）、索靖（239—291）、皇象（三国吴人，生卒年不详）、卫铄（220—291）等等。他们一代接一代，宗师创新，或工于篆籀，或长于隶草，或善于楷行，在书法实用的同时，致力于艺术美的探索 and 追求，书法竟成为人们爱不释手的艺术品，搜罗收藏的宝物。魏武曹操，在军旅紧张之隙，常将梁鹄之书挂于营帐中观赏。王导在丧乱期间，尚不忘把钟繇《宣示表》匿入袖中，带过江左。此种社会风气，推动着书法艺术的蓬勃发展。东晋时期出现的书法艺术的高潮，正是这种蓬勃发展的继续。

虽然汉末以来的连年战争，“铠甲生虮虱，万姓以死还。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遗一，走马震楸间”（曹植《名都篇》），曹操下令禁碑，东汉以来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之“碑碣云起”的侈靡之风骤止，至东晋、南朝、禁碑之令也未除，无形中限制了碑碣书体的发展。但是，也许正由于这种频繁战争的混乱局面，以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作为人生寄托的中国士大夫，都可以借用书法发泄自己的感情和意兴。例如，同宗师刘德升的钟繇、胡昭两人，一个身居高官，一个却避官不就，隐居山林，两人书法艺术成就都很高。他们把书法艺术视同“作诗”、“喝酒”一样，当成精神兴奋剂和寄托意兴的手段。所以，书法并不因时势的兴衰而受到影响。

266年，司马氏建立政权，改国号为晋，接着发生“八王之

乱”，中原士大夫纷纷逃至江左，也带去比较发达的中原文化。司马睿过江以后建立起的东晋政权，317—420年，政治文化中心由中原转移到江南。东晋政权，依靠王导、谢安、庾亮、桓温为代表的北方和南方士族的支持，在百余年的统治期间，虽然有不断的小动乱，但是社会基本是稳定的，经济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。江南山明水秀的地理环境和较为充裕的经济，为统治阶级偏安一隅，过着享乐腐败的生活，提供了物质基础。与书法艺术发展有关系的造纸术，也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剡溪（浙江嵊县）一带四、五百里盛产藤纸，质地极佳，还有用破旧旧麻布作原料制造的麻纸，也为书家提供了较优的书写材料。王羲之曾一次赠送谢安九万张纸，可见当时纸的产量和质量都已达到很高的程度。故桓温下令废竹简，书写材料改用黄纸代替。这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以纸作材料既比缣帛便宜，写起来又比竹简效果好。毛笔技术也有改进，写草书的专用长锋兔毫笔出现了，还出现一种以鼠须做的硬毫笔（传说王羲之写《兰亭序》用的即是此种笔）。王僧虔《笔意赞》中称：“剡纸易墨，心圆管直，浆深色浓，万毫齐力。”这对东晋时期的书法风貌产生以直接影响。因为任何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，总是与所用的工具材料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在这种社会背景下，支持东晋政权的王、谢、庾、桓四大名门士族又都是书法世家，书家辈出。《述书赋》有所谓“博者四庾，茂矣六郗，三谢之盛，八王之奇”的称谓。据窦蒙注解说，四庾是庾亮、庾诤、庾翼、庾准；六郗是指郗鉴、郗愔、郗昙、郗超、郗俭之、郗恢；三谢指谢尚、谢奕、谢安；八王是指王导、王劭、王珣、王羲之、王献之、王钦、王蒙、王述等，实际上当时擅长书法的远远不止这些人。众多从事书法的士人，形成东晋时期的书家群体，他们相互影响，共同竞争，形成东晋书法艺术空前的大发展、大繁荣的局面，王羲之只是这百花丛中独占

鳌头的一枝。

二

王羲之（307—365），字逸少，琅琊（山东临沂一带）人，后居会稽（浙江绍兴）。大伯父王敦，与二伯父王导同辅司马睿，敦进左将军，都督征讨诸军事。二伯父导，任元帝丞相，明帝司马时，任司徒、大司马、中外大都督、太傅。父亲王旷，任过淮南、丹阳太守，会稽内史。他们都专长书法。“敦初以工书得家传之学。其笔势雄健”（《宣和书谱》），《淳化阁帖》刻有他的《蜡节帖》。导书师钟繇、卫瓘，善行草书，“虽秀有余，而实不足”（《宣和书谱》），阁帖刻有他的《省示》、《改朔》等帖，书风很有气势。旷也善行、隶书。另外，对羲之影响较大的还有堂伯父王廙，“羲之少朗拔，为叔父廙所赏，善草隶”（《世说新语·言语篇》），曾任平南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工书画。王僧虔《论书》云：“右军之前，惟廙为最，画为晋明帝师，书为右军法。”张怀瓘《书断》列廙的隶、草为能品，飞白入妙品。与王羲之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一个人物，即派人去王家物色女婿，诸子皆躲起来，惟王羲之袒露东床，遂妻以女的岳父郗鉴，官至太尉，也有书名，《书断》云：“太尉草书卓绝，古而且劲”，“下笔刚决，略无凝滞，厚实深沉，丰茂厚弘丽，而不乏风神”。《淳化阁帖》刻有行楷一帖。王羲之生活在这样一个专长书法的大家庭中，从小就耳濡目染，无疑对他日后书法上取得崇高地位有着直接的影响。

王羲之年幼起即好学，传说十二岁时，即窃取父亲枕下的蔡邕笔法论，父亲知道以后随授以“大纲”。他甚得伯父王导、王敦的器重，称为“吾家优秀子弟”。除了他的书法启蒙教师卫夫人（名铄）以外，以上这些长辈都是他的书法导师。卫铄为西晋

书法家卫恒之侄女，工书，善长隶书，师钟繇并能妙传其法，《淳化阁帖》刻有《和南》行楷书帖，传为唐人摹本入帖，记有王羲之学书情况，说卫铄见逸少幼年书法即有老练之态，说：

“此子必蔽我书名矣！”朝廷公卿也甚爱其才学。初召为侍郎吏部尚书，不受。二十七岁左右，曾为征西将军庾亮参军，累迁长史，进宁远将军、江州刺史，据《右军年谱》称：“四十五岁自护军出为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，”故又称王右军。后与王述不和，述性直燥而贪小利，为宛陵令时，受赠遗，为州司所检，故为羲之所轻，而述蒙显授，羲之之为下。王述检会稽郡，疲于简对，羲之深耻之，遂于永和十一年称病去郡。其晋墓诗云：

“自今之后，敢谕此心，贪冒苟进，是有无尊之心而不予也。”称病去职后，与东土诸名士优游，自适而终。

王羲之书法，传自语云：“予少学卫夫人书，将谓大能，及渡江北游名山，见李斯、曹喜等书，又之许下，见钟繇、梁鹄书，又之洛下，见蔡邕《石经》三体书，又于从兄洽处，见张昶《华岳碑》始知学卫夫人，徒费年月耳。遂改本师，仍于众碑学习焉。”此段话出自《题卫夫人〈笔阵图〉后》，近人余绍宋《书画书录解题》一书称：“其为六朝人所伪托，殆无可疑。”既是伪托，似不可靠，且南北对峙，岂能渡江北游，何能去许下见钟、梁之书，洛下见蔡邕《石经》且说蔡邕的汉《石经》并非三体，只隶书一体，三体之说乃是《后汉书》误记，伪托者以讹传讹，误认为三体，三体者乃是曹魏时《正始石经》。台湾张光宾编著的《中华书法史》则认为，近人余绍宋“以为晋室东渡无由北游，纷为妄言，亦不尽然。盖永和中，殷浩曾入许昌。桓温亦曾规复洛阳，远使修王陵，时羲之辞官，幽游林下，史虽无具体记录，此游非不可能”。且不管他是否北游，但卫夫人宗师钟繇，又是卫恒侄女，卫家三代善草书和古文，自然教之钟法和卫世家之专长。《和南帖》称：“卫氏有一弟子王逸少，甚能学卫

真书，咄咄逼人，笔势洞精，字体遒媚”。又陶弘景《与梁武认书启》云：“逸少学钟，势巧形密，胜于自运。”其草书学张芝，王羲之书云：“顷录诸名书中，钟、张信为绝伦，其余不足存。”羲之既能“博精群法，特善草隶”（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），自然各家都会有所宗，才能博采众长。且说，当时摹搨之术已行世，故见李斯、曹喜、梁鹄、蔡邕等笔迹是极有可能的。可见，羲之宗师甚广，特别是对被誉为“草圣”的张芝和“真书之祖”的钟繇两派书法，曾作过长期临摹和研究。羊欣为南朝宋人，曾得羲之儿子献之亲授书法，其书有“买王得羊”之称，离大王时代甚近，羲之死后五年他出生，故他评羲之书法应具有权威性。他认为，王羲之博精群法，特善草隶，“古今莫二”，可见王羲之晚年以后，已精通各种笔法，“草、隶、八分、飞白、章、行各精，诸体自成一家之法，千变万化，得之神功”，故其后期书作已盖过历代书法家。王羲之自云：“吾书比之钟、张，当抗行，或谓过之，张草犹当雁行。然张成熟，池水尽黑，令寡人耽之若此，未必谢之”（孙过庭《书谱》）。但是，王羲之的早期作品并未成熟，“少年临川时迹，既不足观，亦无取焉”（虞和《论书表》）。庾翼在荆州时，见庾家子弟遍学右军，颇为不平，说：“小儿辈乃贱家鸡而爱野鹜，皆学逸少书，须吾还，当比之”（同上）。后来，见到羲之给其兄庾亮书才折服，写信给羲之云：“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，因丧乱遗失，尝谓人曰：‘妙迹永绝’。今见足下答家兄书，焕若神明，顿还旧观。”庾翼长期在荆州，故对羲之的书法进展并不知情，初闻子弟皆学羲之书，因为翼也是当时名书家，自然自尊心受到影响，故有家鸡野鹜不逊之语，但当他收到羲之给庾亮的真迹后，把羲之的书比之已失却的张芝章草，称颂备至，可见此时羲之的书法已和张芝并驾。梁庾肩吾的《书品》把张、钟、王列为上上品。虞和说：“迨其末年，乃造其极。”羲之书法，当在永和年间才

高度成熟，书名才大显。他在会稽期间的种种传说，也可佐证。如说羲之罢会稽以后，在戴山之下，一日有老妪以十余把六角扇出售，羲之见问一把值几何？答曰二十，右军取笔书扇，每扇五字，老妪不解甚感惆怅云：“举家朝食全仰于此，如何书坏？”羲之云，但凭右军书，字索一百，老妪售之于市，竟相争售一空，当时羲之书名之盛可见一斑。又有书《道德经》换白鹅的故事。传说羲之极爱鹅，山阴县酿村有道士养好鹅十余，羲之一早即乘小船前往，见之兴趣甚浓，乃求市易，道士不与，再三求售不能得，道士乃言自性好道，久欲求人书《老子》，缣素早备，而无人能书，若屈羲之书《道德经》二章，使合群以奉。羲之遂住半日书毕，笼鹅而归。这两则故事都是在永和十年左右的事。出自虞和《论书表》和《晋书·本传》，时具泰始六年九月（470年），是虞给宋明帝上的表，距羲之死才百年余，此种传说当较为可靠。

关于“书圣”荣誉称谓的来历，最早见唐代李嗣真（？—696）《书后品》称：“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，寒暑调畅……可谓书之圣也。若草、行杂体，如清风出袖，明月入怀……可谓草之圣也。其飞白也，犹如雾縠卷舒，烟空照灼……可谓飞白之仙也。”此后，“书圣”称谓遂屡见不鲜。其实，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，有一个复杂的过程。晋后宋、齐时，评论较为实际，离王死不过百年。如宋王僧虔上呈的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称，王羲之“特善草隶，古今莫二”。虞和《论书表》是根据宋明帝在民间搜集历代大量书法作品以后，诏虞和、前将军巢尚云、司徒参军事徐希秀、淮南太守孙奉伯等，科简二王书，评其品第之后上的表，故是看了大量“秘藏”以后对王书的评论，当比较可靠。他说：“羲之书，在始未有奇殊，不胜庾翼、郗愔，迨其末年，乃造其极。”又说：“汉魏钟、张擅美，晋末二王称英”，可说四人同行，只不过“古质今妍”之别。王僧虔的《论书》，